

# 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及交互关系

——以高校智库为例

苏 州<sup>\*</sup>

**【摘 要】** 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发展繁荣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多元、复杂,且因素之间往往存在交互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推动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本文以高校智库为例,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外部层面以及运作方式、经费来源和议题选择三个内部层面建立了我国高校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此基础上,借助灰色DEMATEL方法探讨了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识别了高校智库这一特殊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发展的关键因素、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最后提出了推进高校智库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决策咨询机构;高校智库;灰色DEMATEL方法

作为软科学研究的一种组织形态,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有效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罗军等,1994)。根据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不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官方咨询机构、半官方咨询机构、民办咨询机构(傅广宛和张凌,2016)。决策咨询机构也可以称为智囊团、智库、脑库,是指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组成的组织,其目的是为政府提供科学决策,帮助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包兴荣,2008)。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代表着国家的“软实力”(Nachiappan,2013)。当前,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为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决策咨询研究机构提供智力支撑,谋划解决方案。

高校智库作为决策咨询研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附设于高校之中,依托高校特色学科,集聚知名学者,以国家发展为导向,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通过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协同性、综合性地研究,从而影响政策方案(全守杰和王运来,2016)。高校智库因其特殊的组织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决策咨询的独立性,因而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高校把对策性研究作为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13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学科、人才等方面的

---

<sup>\*</sup>苏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211106。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1ZDIXM037)阶段性成果。

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教育部2014年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也旨在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改革智库管理方式,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决策咨询机构的研究起步都比较晚,对比其他学科和领域而言,研究成果较为薄弱。目前,围绕决策咨询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路径、功能定位和别国经验借鉴三个方面。褚松燕和赵成根(2005)揭示了西方思想库生存的独立性、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性、社会价值的非营利性,试图为中国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傅广宛(2010)从中西方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政策决策咨询机构的“中国特色”内涵,探究中国特色政府决策机构的发展路径。汪凌勇(2014)以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为对象,考察科技决策咨询机构的现状、特征和变革趋势,并将科技决策咨询机构划分为国家最高科技咨询审议机构、政府科学顾问机构和半官方、民间智囊机构三类。程贞玫和高明(2016)认为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建设上需突出特色,强调协同,由此提出通过构建供求对接平台、组建专业智库团队、建立激励考核机制等途径推动高校智库建设。舒刚(2016)在大数据视角下剖析高校智库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而从评价机制、战略定位、发展理念和运行机制提出了高校智库变革之道。李洪修和张晓娟(2016)分析了高校智库发展的学科协同、多方协同和利益协同,并从协同视域构造了高校智库发展的主要维度。

总体来看,针对决策咨询机构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并大致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多维度论证了我国决策咨询机构建设存在的问题,但提出的政策多大而化之,往往针对性较弱;二是研究工作虽发挥了专家智慧,但集成性有待强化,以定性阐述为主,缺乏结合定性与定量的集成研究;三是探讨决策咨询机构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有限,这不利于深入挖掘和破解关键制约因素。本文尝试探讨决策咨询机构的一种特殊形态或新型形态——高校智库,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内部、外部等诸多复杂、交织的因素,在建立因素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灰色DEMATEL方法充分发挥不同专家群体智慧,以识别高校智库发展影响因素间的交互关系,从而遴选其中原因因素、结果因素和关键因素,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高校智库发展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 一、影响高校智库发展的因素体系

影响高校智库发展的因素涉及多个方面,本文从与智库运作相关的外部 and 内部两个层面进行总结,建立如图1所示的影响因素体系。其中,外部因素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内部因素涉及运作方式、经费来源和议题选择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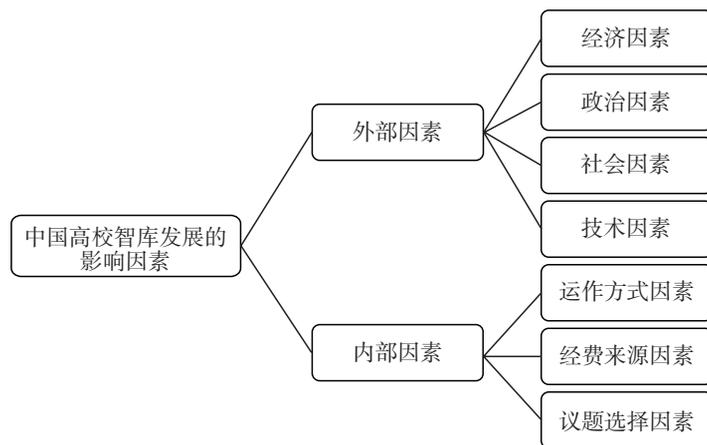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 （一）外部因素

### 1. 经济因素

从纵向来看,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基本也是经济发展的写照。高校智库发展不同于官方智库,起步较晚。198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首个高校智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国家经济面临新的形势。智库因能够在社会进步、行政改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地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次贷危机、通货膨胀、油价剧烈波动等问题接踵而至。政府部门迫切需要更多新的智力和政策来源,也使得高校智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夏春海和王力,2013)。

从横向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的经济水平基本相当。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中心根据调查数据给出了中国活跃智库分布的区域特征(表1)。可以看到,约三分之二的活跃智库均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其余地区的活跃智库不足三分之一。从各省的分布格局来看,活跃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其次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智库的发展历史,也是经济不断蓬勃发展的历史。一方面,经济动态调整促进了对高校智库在内的多方智囊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也是促进智库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国外基金会也是助力高校智库发展的另一经济因素。在欧美等主要国家,基金会一直是智库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国也有少量的高校智库得到了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要依靠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表1 中国活跃智库区域分布特征

区域分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网络及不确定
数量(家)	162	37	37	8
占比(%)	66.4	15.2	15.2	3.2

数据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

### 2. 政治因素

与官方智库类似,高校智库具有影响公共政策的性质,是一种为公共决策提供知识和智力服务的机构。因此,高校智库的发展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往往非常直接,具体包括政治体制、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等因素。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国会和联邦法院都需要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巩固自己权利范围内的治理,这一政治制度为智库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有着本质区别,智库不需要扮演政党之间权利争夺和为不同利益主体进行“政治游说”的角色(夏春海和王力,2012),其主要功能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担任政府“大脑”。随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高校智库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发展势头远超其他任何时期。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对高校智库建设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在美国,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之间身份转化的现象称为“旋转门”制度;在中国,政府官员和高校智库学者之间身份的转换机制目前还不够灵活通畅,从智库学者走出的政府官员寥寥可数,由高校智库“旋转”至政府部门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肯定的是,官员和高校智库交流频繁,并在高校智库中担任重要职务对智库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仅可以提升智库的影响力,也有利于智库成果的有效采纳。

### 3. 社会因素

任何一种机构,其发展都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环境。智库的性质、公众参与决策的热情和税收优惠制度是社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智库的性质涉及到智库建设的身份问题,公众的参与决策的

热情关系到智库成果能否顺利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涉及智库的运营成本问题。高校智库多隶属于高等院校,往往以高校科研机构的形式存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上不能独立核算。在经费来源上,大学智库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社会或者企业捐助等。如果智库所在高校发展水平良好,科研经费充足,其智库拨款可能就会更多;相反,资金不充裕,则会限制其发展。公众参政议政热情也会为高校智库的大量产生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高校智库的研究主题若与公众生活密切程度高,公众参与其中的热情也就越高,从而成为社会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税收优惠制度对高校智库发展也有较大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智库经营的税收优惠以及获得捐赠的优惠。

#### 4. 技术因素

人类历史的多次突破性发展都起源于技术引发的革命。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运用对智库发展也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关机构应用现代方法和技术从事专业研究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高校智库可依托学科资源、借助人才集聚优势发挥技术所长,专业分工和综合分析使得高校智库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不仅拓宽了智库间的合作渠道,也提高了智库影响公共决策的时效性,对公众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在复杂网络环境下,大数据为高校智库的智能决策提供了思维和技术的双重工具。与此同时,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也倒逼高校智库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变革。

### (二) 内部因素

#### 1. 运作方式因素

图2为中国高校智库运行结构,从政府流向高校智库的箭头代表资金流,从高校智库流向政府的箭头为研究成果,智库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通过媒体反馈给政府和公众,扩大其影响力。除了前文提到的经费,媒体宣传也是扩大影响力、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影响着高校智库的发展。此外,独立性是高校智库运作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关键。高校智库的信息公开有利于研究基金组织提升资助效率,确保资助渠道多元,避免资助渠道单一引起的利益俘获现象;媒体对智库资助经费开支情况、研究成果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报道,有利于舆论对智库施加压力,使其趋于更加客观、中立地做出决策;同时,智库透明度有利于智库间的监督制衡,为彼此间的监督评价提供可靠的数据和信息;还有利于政府了解智库建设情况,发挥智库研究的比较优势,可以针对性地寻找合适的高校智库开展决策咨询或课题委托。因此,信息透明度是高校智库运作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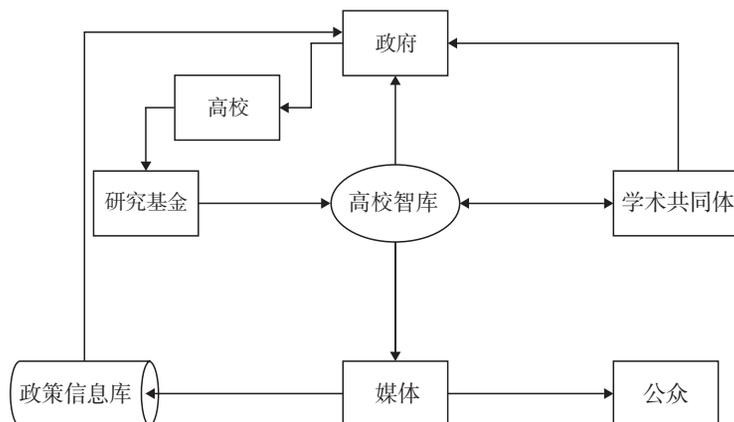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智库的运行体系结构

## 2. 经费来源因素

基本的经费要求是维持各类智库正常运行的前提。高校智库的收入来源包括财政拨款、智库营收、个人收入、企业捐赠等,其中任何一项变动都会引起智库收入的变动。为了保持经费来源稳定性,很多智库在资金筹措上采用多元化战略,通过多元化资金来源分担风险,而不是依靠单一来源。在国内资助或政府委托缩减的情况下,一些高校智库开始寻求国外基金支持。美国国家事务性智库的历史经验发现,智库的研究范围与预算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智库的研究范围是高校智库营收的理性选择(安德鲁·里奇,2010)。

## 3. 议题选择因素

已有经验表明,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基本都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聚焦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专业方向,并在这些领域建立了同行公认的权威性。如美国兰德公司因在军事和国防发展战略领域出色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大大加速了其智库的发展。高校智库最初主要由各高校设立的研究所整合而成,其研究议题的选择主要根据自身学科特色,发挥自身人才集聚的优势跨学科、跨学院开展研究。因此,高校自身学科建设和人才优势是高校智库议题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影响到高校智库的发展。

# 二、高校智库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

## (一) 灰色DEMATEL方法的思路和步骤

DEMATEL方法是一种综合运用图论和矩阵论原理进行系统因素分析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借助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直接影响矩阵,计算各因素对其它因素的影响程度以及被影响度,从而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王伟伟等,2013; Hsu等,2013)。由于传统DEMATEL方法在专家打分时赋值过于确定,往往难以符合现实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引入灰数模糊方法建立柔性的数学决策模型,使专家分析更加柔性,避免出现太大的失误(Asad等,2016)。主要步骤如下:

(1) 确定制约高校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对象的相关信息,建立初步的指标体系。根据前文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分析,得出由7个维度13个指标构成的高校智库发展影响因素体系(表2)。

表2 高校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维度	编号	因素
外部因素	经济因素	S <sub>1</sub>	经济发展水平
		S <sub>2</sub>	受国外基金会资助
	政治因素	S <sub>3</sub>	出台智库建设政策文件
		S <sub>4</sub>	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担任职务
	社会因素	S <sub>5</sub>	学校发展水平
		S <sub>6</sub>	与公众生活密切程度
		S <sub>7</sub>	税收优惠程度
	技术因素	S <sub>8</sub>	智库人员学历层次
		S <sub>9</sub>	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内部因素	运作方式因素	S <sub>10</sub>	媒体宣传和推广人员占智库人数比重
		S <sub>11</sub>	智库透明度
	经费来源因素	S <sub>12</sub>	研究范围
	议题选择因素	S <sub>13</sub>	高校学科及人才优势资源

(2) 基于灰数系统理论, 构建不同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专家建立由语义变量构成的13个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X$ 。将专家语义变量按照没有直接影响 $[0, 0]$ 、有弱影响 $[0, 0.25]$ 、有中等影响 $[0.25, 0.5]$ 、有较强影响 $[0.5, 0.75]$ 和非常强影响 $[0.75, 1]$ 共五个等级对专家调研问卷进行灰色矩阵转换, 得到 $13 \times 13$ 的灰数矩阵, 若 $i=j$ , 则 $\alpha_{ij} = 0$ 。

(3) 利用公式(1)-(3), 对灰数矩阵进行清晰化处理,  $m$ 为专家数量。  
灰数上下界的标准化如下:

$$\underline{\otimes}x_{ij}^{-m} = \left( \underline{\otimes}x_{ij}^m - \text{Min}_j \underline{\otimes}x_{ij}^m \right) / \Delta_{\text{min}}^{\text{max}} \quad (1a)$$

$$\overline{\otimes}x_{ij}^{-m} = \left( \overline{\otimes}x_{ij}^m - \text{Min}_j \overline{\otimes}x_{ij}^m \right) / \Delta_{\text{min}}^{\text{max}} \quad (1b)$$

$$\Delta_{\text{Min}}^{\text{Max}} = \text{Max}_j \overline{\otimes}x_{ij}^m - \text{Min}_j \underline{\otimes}x_{ij}^m \quad (1c)$$

灰数标准化后的清晰值:

$$y_{ij}^m = \frac{\underline{\otimes}x_{ij}^{-m} \left( 1 - \underline{\otimes}x_{ij}^{-m} \right) + \overline{\otimes}x_{ij}^{-m} \times \underline{\otimes}x_{ij}^{-m}}{1 - \underline{\otimes}x_{ij}^{-m} + \overline{\otimes}x_{ij}^{-m}} \quad (2)$$

计算清晰值:

$$z_{ij}^m = \text{Min}_j \underline{\otimes}x_{ij}^m + y_{ij}^m \Delta_{\text{Min}}^{\text{Max}} \quad (3)$$

(4) 利用公式(1)-(3)对矩阵 $X$ 进行清晰化得到矩阵 $Z$ ,  $Z_{ij}$ 为权重矩阵中第 $i$ 行第 $j$ 列的元素, 再对各专家得到的清晰值取平均。

$$\overline{Z} = \frac{1}{m} \left( Z^1 + Z^2 + \dots + Z^m \right) \quad (4)$$

(5) 直接影响矩阵的正规化。将 $\overline{Z}$ 的各行求和, 设行和最大值 $\text{max}$ , 令 $A = \overline{Z} / \text{max}$ 。

(6)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求综合影响矩阵 $T$ 以分析因素间的间接影响关系。

$$T = A(I - A)^{-1} = (t_{ij}) \quad (5)$$

(7) 影响因素分析。矩阵 $T$ 中元素 $t_{ij}$ 表示因素 $i$ 对因素的 $j$ 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程度, 或因素 $j$ 从因素 $i$ 受到的综合影响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矩阵 $T$ 的每个元素 $t_{ij}$ 来进一步考察因素之间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以及中心度与原因度。具体如下, 矩阵 $T$ 的各行元素之和为 $T_r = [T_r(1), T_r(2), \dots, T_r(n)]^T$ 表示该行元素对所有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称为影响度。 $T$ 的各列元素之和 $T_c = [T_c(1), T_c(2), \dots, T_c(n)]^T$ , 表明该列元素受到所有其他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称为被影响度。

(8) 中心度和原因度。因素 $S_i$ 的中心度为 $M_i = T_r(i) + T_c(i)$ , 表示该因素在指标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所起作用大小。因素 $S_i$ 的原因度为 $R_i = T_r(i) - T_c(i)$ 。如果 $R_i > 0$ , 表明该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大, 称为原因因素; 如果原因度 $R_i < 0$ , 表明该因素受其他因素影响大, 称为结果因素。

(9) 通过以上计算, 可以根据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判断出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力, 再根据中心度判定出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 根据原因度大小确定各要素在系统所处的位置, 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 (二) 结果与讨论

根据灰色DEMATEL方法的应用步骤,首先需要确定高校智库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矩阵。在参考已有智库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江苏紫金传媒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软科学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与环境治理研究院9位专家的访谈,得出了影响高校智库发展的灰数矩阵,并利用公式(1)-(4)将灰数矩阵进行清晰化处理,得到表3。表3可以直观全面的展现各因素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无法判断某一因素的重要程度,无法识别高校智库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此,对表3的直接影响矩阵进行转化,得到各因素间的综合影响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高校智库发展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如表4所示。

表3 高校智库发展的直接影响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	1.20	0.98	0.43	0.73	1.60	0.28	0.92	1.59	2.24	1.70	2.11	1.36	0.89
S2	0.58	0.94	0.07	0.49	0.47	0.15	0.40	0.68	0.91	0.44	0.89	0.17	0.27
S3	0.38	1.79	1.87	0.16	1.60	1.01	0.70	0.50	2.65	1.09	1.24	0.68	1.25
S4	1.06	0.98	0.34	0.83	0.65	0.61	1.02	0.82	1.82	0.19	1.02	0.41	0.82
S5	0.31	1.38	0.40	0.13	1.69	0.34	0.06	0.82	0.83	0.77	0.97	0.29	0.28
S6	0.00	0.75	0.00	0.13	0.00	0.17	0.00	0.00	0.36	0.22	0.17	0.08	0.00
S7	0.10	0.32	0.73	0.00	0.48	0.17	0.00	0.20	0.88	1.46	0.83	1.12	0.77
S8	0.26	0.09	0.05	0.00	0.03	0.00	0.00	0.73	0.90	0.07	0.50	0.57	0.97
S9	0.00	1.05	0.59	0.00	0.11	0.00	0.00	0.00	1.74	0.75	0.05	0.44	0.19
S10	0.00	0.29	0.46	0.00	0.23	0.00	0.00	0.00	0.44	0.94	0.72	0.45	0.38
S11	0.40	0.95	0.89	0.40	0.44	0.08	0.36	0.21	1.35	1.64	1.32	0.84	0.57
S12	0.07	0.01	0.85	0.10	0.41	0.11	0.10	0.00	0.68	0.73	0.00	0.98	0.55
S13	0.33	0.26	0.56	0.00	1.04	0.14	0.05	0.92	1.35	0.43	0.77	0.92	1.47

表4 高校智库发展因素的综合影响关系表

	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外部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S1)	1.8377	0.4971	2.3348	1.3406
	受国外基金会资助(S2)	0.7497	1.1691	1.9188	-0.4195
	出台智库建设政策文件(S3)	1.7202	0.8747	2.5948	0.8455
	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担任职务(S4)	1.2418	0.3132	1.5551	0.9286
	学校发展水平(S5)	0.9351	0.9927	1.9278	-0.0576
	与公众生活密切程度(S6)	0.1962	0.3249	0.5211	-0.1288
	税收优惠程度(S7)	0.7818	0.3778	1.1596	0.4041
	智库人员学历层次(S8)	0.4617	0.7013	1.163	-0.2396
	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建设(S9)	0.5319	1.8989	2.4308	-1.3671
内部因素	媒体宣传和推广人员占智库人数比重(S10)	0.4455	1.2368	1.6823	-0.7913
	智库透明度(S11)	1.0946	1.1847	2.2793	-0.09
	研究范围(S12)	0.5300	0.9462	1.4762	-0.4162
	高校学科及人才优势资源(S13)	0.9381	0.9468	1.8849	-0.0088

由表4可以看出,在制约高校智库发展的因素体系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影响度数值为1.8377。紧随其后的影响因素为出台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1.7202)、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中担任

职务 (1.2418) 和智库透明度 (1.0946)。其余因素的影响度都小于1, 影响力较为有限。特别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程度等因素与高校智库发展的相关性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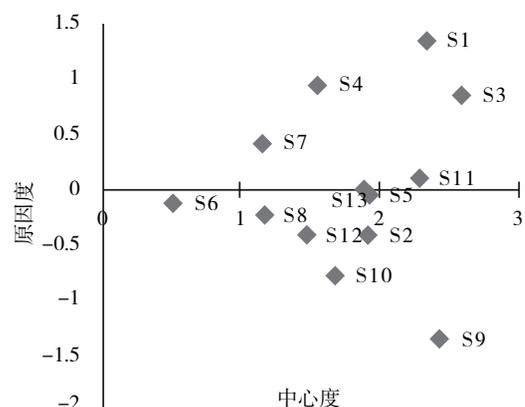


图3 高校智库发展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

图3进一步给出了各影响因素原因度和中心度的分布情况。由图3中的原因度分布情况可以发现。首先, 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度排第一 (1.3406), 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高校智库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该结论不仅验证了已有研究中智库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观点 (金彩红和黄河, 2016), 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是智库发展的主要动力; 其次, 原因度排第二位的是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担任职务 (0.9286), 表明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担任职务在智库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立高校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不可忽视; 第三, 出台智库建设政策文件 (0.8455) 的原因因素排在第三位, 说明其对于促进高校智库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是近几年, 政策文件的出台使得高校智库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外, 税收优惠程度的原因度也为正 (0.4041), 可以对高校智库发展起推动作用。

其余因素的原因度数值均小于0, 是结果因素。需要注意的是, 与内部因素相关的指标均属于结果因素, 而不在原因因素之列。这表明, 相对于高校智库运行的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对高校智库发展的影响更为基础, 而内部因素更加依赖于外部因素, 处于被动地位。

表4中, 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因素是出台智库建设政策文件 (2.5948)、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2.4308)、经济发展水平 (2.3348)、智库透明度 (2.2793), 较高的中心度体现了这些因素在制约高校智库因素体系中的核心与关键作用。

从内外部因素体系的七个维度来看 (表5), 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原因度大于0, 属于原因因素; 技术因素、运作方式因素、经费来源因素、议题选择因素的原因度小于0, 属于结果因素; 经费来源因素、运作方式因素和技术因素三者的中心度也较高, 但三者都是结果因素, 说明其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制约程度较大。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都为较大的正值, 经济因素的中心度大于政治因素, 而政治因素的原因度却大于经济因素, 表明两者对高校智库的建设都非常关键。与政治因素相比, 经济因素对高校智库的促进作用更强。由于政治因素的原因度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排在首位, 因此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必要条件。社会因素的原因度为正值, 表明社会因素也对其他维度影响较大, 但是影响力没有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议题选择因素相比于其他六个维度, 在七个维度中制约因素最弱, 且受其他维度影响, 处于被动状态。

表5 高校智库发展各维度之间的交互关系

维度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经济因素	2.5874	1.6662	4.2536	0.9211
政治因素	2.962	1.1879	4.1499	1.7741
社会因素	1.9131	1.6954	3.6085	0.2177
技术因素	0.9936	2.6002	3.5938	-1.6067
运作方式因素	1.5401	2.3219	3.7812	-0.8626
经费来源因素	0.5300	2.4215	3.9616	-0.8813
议题选择因素	0.9381	0.9468	1.8849	-0.0088

###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高校智库为例,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建立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运作方式因素、经费来源因素、议题选择因素七个维度的决策咨询机构发展影响因素体系。运用灰色DEMATEL方法得出了各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1)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因素较大的指标有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台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2)卸任官员在高校智库中担任职务的原因度大于0,说明“旋转门”机制是高校智库繁荣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议题选择因素在七个维度中的影响作用最弱,且易受其他维度影响;(4)智库透明度的影响度和中心度的数值表明该指标对高校智库的发展非常重要,但其原因度却为负,表明该因素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束缚,不利于智库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推进高校智库良性发展的三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保障高校智库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政府应主动对接高校智库,培育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环境,健全体制机制,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创新政府和高校智库人才流动机制,实现政策“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角色互换。同时,设立高校智库专项资金,实行政策性与开放性兼顾的长期性公益研究基金,对智库建立的条件、程序、方法、效率等进行明确规定,从源头上把关,提升高校智库创建质量。

第二,精准定位高校智库议题选择,点面结合进行研究。高校智库未来还需精准定位自身特色,发挥在基础理论、学科综合、人才集聚、思想独立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中国实际,瞄准国际前沿,充分发挥智库咨政启智作用,为党和政府提供基础性、理论性和前瞻性决策咨询服务,形成国家战略层面或地方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同时,高校智库要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向上向下、对内对外多维度传播智库成果,扩大自身影响力。

第三,提升高校智库运行透明度。高校智库可考虑建立智库年报制度,向社会报告智库相关活动、研究课题及资金来源等信息,通过统一的智库规范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智库所在高校应加强智库透明度管理,在资助经费的申报、立项和结题要求中,增加智库透明度指标。政府决策部门也应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国家治理透明度的提高带动高校智库透明度的提高,同时,通过高校智库透明度的提高,不断倒逼国家治理透明度的提高,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推动。

#### 参考文献:

- 安德鲁·里奇,2010:《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包兴荣:《试论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发展与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决策咨询通讯》2008年第5期。
- 程贞玫、高明:《论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褚松燕、赵成根:《西方思想库咨询模式对我国决策咨询机构发展的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 傅广宛:《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中国特色”内涵研究——以中西方比较为研究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 傅广宛、张凌:《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重复建设与治理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 金彩红、黄河,2016:《欧美大国智库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李洪修、张晓娟:《协同视域下大学智库发展的维度分析》,《江苏高教》2016年第2期。
- 罗军、张宛生、罗秉贤:《软科学与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工作》,《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21期。

全守杰、王运来:《高校智库的涵义与特征》,《现代教育管理》2016年第1期。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5:《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舒刚:《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转型》,《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8期。

汪凌勇:《国外科技决策咨询机构现状、特征与变革趋势》,《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5期。

王群伟、杭叶、于贝贝:《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关系》,《科研管理》2013年第S1期。

夏春海、王力:《美国智库发展的内外驱动力》,《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夏春海、王力:《中美智库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比研究》,《前沿》2013年第1期。

Asad, M. M., V. Mohammadi & M. Shirani, 2016, “Modeling Flexibility Capabilities of IT-based Supply Chain, Using a Grey-based DEMATEL Method”,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36, pp. 220—231.

Hsu, C. W., T. C. Kuo, S. H. Chen & A. H. Hu, 2013, “Using DEMATEL to Develop a Carbon Management Model of Supplier Selection in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Journal of Clear Production*, vol. 56, pp. 164—172.

Nachiappan, K., 2013, “Think Tanks and the Knowledge-policy Nexus in China”, *Policy and Society*, vol. 32, pp. 255—265.

(责任编辑:杨嵘均)

## System of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actors Influenc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stitutes: Taking Think Tanks in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SU Zho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stitutes is related 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stitutes are diverse and complex, and there is alway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aking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ystem of factors from the four external dimension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ali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hree internal dimensions of operation mode, fund sources, and research subjects. The grey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identify the primary factors, causal factors and outcom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itutes.

**Key words:**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stitutes;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ey-DEMATEL method